

纪念汪世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 “艺术史文献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小玄 陈波帆

2023年5月20—21日，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安徽黄山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举办纪念汪世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艺术史文献研究”学术研讨会。来自浙江大学、暨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美术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黄山学院、美国普吉海湾大学、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院、故宫博物院、天一阁博物院等高等院校及学术机构的26位学者，围绕“艺术史文献”这一核心主题，就汪世清先生的贡献、史料与图像、文献与理论、文献的开拓以及新材料和新方法等论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汪世清先生(1916-2003)，安徽歙县人。生前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是物理教育和物理学史领域的专家，也是著名的徽州学家和明清艺术史学者。汪先生青年时代受黄宾虹、汪采白等先辈影响，对徽州书画文献的搜集与整理产生浓厚兴趣，并由此拓展到整个明末清初书画家和艺术史的研究，对艺术史文献的开拓有重要的开创之功。今年是汪世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此次会议在纪念汪先生的同时，希冀在强化搜寻与细读艺术史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艺术史文献的视野，推动艺术史研究走向深入。

一 汪世清先生的学术遗产与影响

汪世清先生对后辈学术道路的指引与提携是此次研讨会的重要议题。在本单元中，学者们分享了自己受教于汪先生或与其直接交往的经历，展现了汪世清先生潜心学术、慷慨待人、关怀后辈的人格风采，以及先生对艺术史、文献学以及徽州学所做出的贡献。

中央美术学院薛永年在《汪世清先生与美术史文献》报告中首先分享自己在三十年前与汪先生交往的细节，继而谈论自己在先生启发下对美术文献学的新思考。汪先生对美术文献的研究始于安徽文献，其后陆续完成了对浙江、石涛、郑昉、程邃以及黄山画坛诗文集资料的整理与研究。薛永年指出，汪先生在美术文献学所涵盖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与考证学等方面都有贡献，尤擅研究书画家考、作品考以及作品辨伪等问题。一方面，先生服膺江永、戴震等乾嘉学人的求实精神，继承并发扬传统的文献考证法；另一方面，先生在考证中融合了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最后，薛永年结合当今文献获取与使用的现状，指出E考据在便于文献检索的同时也导致材料的零碎化，因此学习汪先生的文献学功夫和考证方法极为重要。

美国普吉海湾大学洪再新的《金石学与中国艺术的现代性——劳费尔金石拓片收藏和汪世清徽学文献研究的全球艺术史语境》，通过回忆自己与汪先生多年来的交往，勾勒出先生文理贯通且具有全球化视野的学术形象。洪再新首先回顾了他与汪世清、高居翰等学者的学术交游，以及汪先生后续对其黄宾虹研究的指导。之后以

汉学家劳费尔对中国书画的研究及影响为参照，检视汪世清先生如何通过现代文献学研究，将徽州金石学传统和黄宾虹的世界意义发扬光大，为世人展示出新的学术视野。汪先生重视一手资料的史源学工作，并确立了作为艺术史文献基础的疑年学，其学术建树体现着中国金石书画运动与19世纪西方艺术“永久革命”并行的历史脉络，显示出金石学与中国艺术的现代性。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张子宁的《1984-2003:我与汪世清先生的廿年书画缘》，围绕他研究的黄山画僧雪庄，谈论了与汪先生交往的细节。1984年，他与汪先生相识于安徽省文学艺术研究所举办的“黄山画派学术讨论会”；1986年，他为纳尔逊博物馆购入雪庄《黄海云舫图》，又在1996年为弗利尔美术馆收入《雪庄和尚精品册页》，希望能通过研究让更多人认识这位久居黄山深处的画僧。在此过程中，汪先生不仅为其提供了雪庄画作中上款人等信息，还以《雪庄的五开本黄山图册》一文呼吁国内学者重视雪庄的艺术价值。汪先生共给张子宁写过103通信，最后一通落款时间距其逝世不到三个月，而信中仍在考证王槩十二开册页中的题跋信息。

浙江大学白谦慎的《汪世清先生对我的学术指引》，回顾了自己与汪先生的交往，以及参与整理出版汪先生著作的工作。白谦慎与汪先生初识于1991年耶鲁大学举办的“八大山人研讨会”，自此开始向其请教学术问题，并在资料查找方面得到了汪先生的无私帮助。接着，他总结了目前汪先生著作的整理出版情况，包括其生前出版的《浙江资料集》和《艺苑疑年丛谈》，以及去世后出版的《石涛诗录》《卷怀天地自有真·汪世清艺苑查疑补证散考》《明清黄山学人诗选》《汪世清谈艺书简》《汪世清辑录明清珍稀艺术史料汇编》等。白谦慎指出，对汪老相关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工作还在进行中，先生的遗稿、著述以及友朋的书信等仍有待收集并整理出版。

安徽日报社鲍义来在《我是怎样收集汪先生的书信的》一文中，以编者的视角回顾了《汪世清谈艺书简》成书的全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整理出版汪采白画册为契机，鲍义来结识了汪先生，并获得其许可展开系统性的书信收集工作。在白谦慎的大力支持下，他得以收集整理1600多通汪先生写给海外学者的书信，编入《汪世清谈艺书简》四册本。鲍义来指出，汪先生的书信皆为解决实际的学术问题，反映出其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黄山学院方利山《汪世清先生的徽州学研究》一文，讲述了汪世清先生对徽州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方利山特别指出，黄山学院特设的“汪世清先生捐赠特藏”书室，存有汪先生多年来对徽州文献不懈索求的心血结晶，体现着其与夫人沈家英对徽州学的无私奉献。

北京外国语大学吴浩《汪世清先生〈胡公颂〉及其“纪念碑性”》一文，通过还原汪世清先生对《胡公颂》的撰写及勒石树碑过程，阐发《胡公颂》所蕴含的“纪念碑性”。《胡公颂》在承载着徽州现代教育史、学术文化史的同时，也代表着徽州文脉的生生不息。

二 徽州书画文献的开拓

徽州是中国艺术史上的重镇，该地区书画家及徽商群体在明清书画的创作、收藏、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汪先生潜心于徽州学、明清画史，尤其是新安画派的研究，因此明清徽州地区的书画研究也是本次会议的重点。该部分报告基于汪先生过往的资料收集与整理研究工作，许多被先生关注或重视的领域均有了较大推进。

浙江大学博士陈祎玮的《清初徽州的画商与画家——以〈拜经斋日记〉为中心》，以汪先生极为关注的徽籍

画家郑玟的《拜经斋日记》为中心，梳理出活跃在清初徽州及江南地区的书画商60余人。在清初徽州收藏式微的情境下，这些书画商或在徽州县城、府城开设商铺，或奔走于徽州与江南地区之间，或上门兜售藏品。艺术品交易的范围也由经籍书画、碑帖古玩，扩大至出土文物、洋物，以及本地画家的当代作品。在书画商与画家的合作下，书画伪作也被制作与售卖。陈祎玮指出，无论是书画委托、鉴定、还是作伪，均离不开画商与画家的密切合作，这也是清初徽州艺术品市场较为活跃的重要原因。

《垢道人印谱册》是汪先生知晓却未能得见的重要材料。浙江大学薛龙春的《耆旧故事的在场者：程邃的社会交往与文化资本》一文，通过梳理新见的《垢道人印谱册》以及新发现的两种程邃印谱，探讨程邃在明末清初的社会交往及其文化资本。程邃受印人的范围涵盖大半个中国，且多位高权重者。除了扬州独特的地理与文化象征地位之外，程邃艺术上的多能自是其声名显在的原因之一。而他在晚明与黄道周、杨廷麟等人的密切交往也成为重要的文化资本，促使他在入清后有更大范围的社会交往。随着时间的推移，程邃自己也成为耆旧，他的文化资本转化为人们对其篆刻的渴求，对于政治选择各不相同的士人均具有非凡的吸引力。

山东艺术学院张义勇的《从“赏鉴家”到“好事者”：晚明徽商程梦庚的收藏人生》，借助《榆村程氏族谱》、徽州文书以及其他文献，细致钩沉了晚明徽商程梦庚的收藏生涯。具体讨论程梦庚的家世、寓居嘉兴的原因、如何通过汪砢玉、李日华、董其昌等人的交游及收藏活动，构建其赏鉴家形象，以及最后“古玩致祸”的凄凉结局。程梦庚的收藏在其谢世后快速散佚，而董其昌对其生前身后的评价，也由“赏鉴家”变为“好事者”，表明晚明社会在“士商互动”的冲击下，士商界限虽逐渐模糊，但仍以商人追求文化身份的认同为主。而董其昌对程梦庚态度的转变，也将晚明商人群体的被动与无奈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艺”应用软件研究员刘鹏的《落魄山人：友朋眼中的吴守淮》，通过信札、诗卷、家谱等文献材料，勾勒出明代嘉万年间的山人吴守淮的落魄人生。吴守淮字虎臣，歙县西溪南人，屡试不第后成为山人。在分得巨万家产后，他豪游江浙吴越之间，斥巨资买入法书名画，开南吴氏书画收藏之风。吴守淮在受到徐渭的指点后转而作诗，与沈明臣、欧大任等名士唱和。而其善饮酒、好骂座，孤狂乖僻，最终落得千金败尽、收藏散佚的结局。吴守淮存世墨迹有三种，皆写给徽州商人方用彬。其又与汪道昆相友善，与王世贞、王世懋、钱穀、徐中行等皆有交往，从友朋的赠行诗中，亦可窥明代中后期山人的普遍遭遇。

三 唐宋元书画史料与图像

文献与文物是研究艺术史的两大数据资源。传统文献学强调考证、校勘与辑佚工作，文物实物与图像则为研究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解释空间。本单元报告以唐宋元传统书画论著为研究对象，在运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考据学等传统文献方法的同时，引入图像与文本联合追踪的方法，解决了诸多书画研究中存留的问题。

四川大学韩刚的《张彦远仕履与〈历代名画记〉成书考述》，以张彦远仕履的官职、时间、任期与具体职责为切入点，探讨张彦远所历官职对《历代名画记》成书的影响。大中元年（847）张彦远通过荫官任左补阙，此后先后任祠部员外郎、主客员外郎、兵部员外郎、大理卿。韩刚认为《历代名画记》的初稿写作始于张彦远任左补阙一职时，源于该职务观览内府书画之便。在任祠部员外郎时，张彦远所掌管的僧尼之事利于其增补《历代名画

记》中两京外州寺观画壁部分，任主客员外郎时可能增补《职贡图》《外国图》等内容。兵部员外郎、大理卿的任职经历进一步影响了张彦远拣择画家、铨选名画的准则与方式。总而言之，不同阶段的历职经历深刻影响了张彦远的思维方式，也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他用一生修订的《历代名画记》。

中央美术学院黄小峰《矾头与凌面：一次艺术史文献与图像的联合追踪》一文，梳理了宋代以来对“矾头凌面”概念的认知变迁过程，并尝试重构“矾头凌面”与北宋山水画图像的对应关系。“矾头”和“凌面”本是北宋后期山水画论中描述山石画法的概念。元代黄公望对“矾头”的理解演变为“山顶的小块山石”，并将其与董源、巨然的山水画相联系。至明代中后期，“矾头皴”成为定型的皴法程式之一。黄小峰指出，“矾头凌面”概念的产生与北宋的矿物知识以及矿物晶体的欣赏风尚有密切关联，“矾头”指矾石晶体组合而成的晶簇，“凌面”则指冰晶。元人的新解释是重新审视董、巨绘画，并建构“矾头”与董、巨传统关系的结果，此后将“矾头皴”与“披麻皴”并行更让此观念广泛传播，在北宋矿物知识之外建立起新的知识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祁小春的《日藏宋刊苏轼写刻本〈楞伽经〉考》，聚焦于现仅存于日本京都东寺与东福寺的北宋刊苏轼写刻本《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并对此本的过往研究、刊刻时间与地点、现存版本校勘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据祁小春考证，这一写刻本初刻于北宋元丰八年（1085），重刻于元祐三年（1088），可见刻、印时间均在苏轼生前。该写本在中国已失传九百多年，目前所知仅见于日本。通过对比东寺本与东福寺本，可知二者为同一版本，但有印制先后之别。相对于东福寺本，东寺本作为后印本的呈现效果略逊于前者。此外，日藏宋刊苏写本《楞伽经》前有蒋之奇序，后附刻经僧跋文，虽皆为苏轼手书体，但与经文字迹差异甚大，推测可能为旁人仿苏体所作或后来镌板时请苏轼补书而成。

上海师范大学彭莱的《〈林泉高致〉附录问题再考——兼论北宋山水画学的要诀体》，从学术史的角度挖掘并整理了《林泉高致》纂辑与流传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版本，并对附录中三篇画论——王维《山水诀》、荆浩《山水赋》和李成《山水诀》的产生与内涵作出推论。通过对比现存八种《林泉高致》的版本编排与内容，彭莱总结出两个主要的版本系统，一种以四库本和明抄本为代表，将附录与正文共同编入；一种以詹景凤《王氏画苑补益》和唐顺之《荆川稗编》为代表，将《林泉高致》与其他山水画论分开编排。通过画论与《林泉高致》的内容对比，彭莱指出附录的画论更像是后人从《林泉高致》中提炼的“画法要诀”，讲述如何进行观察、取景、布局、组织和造型，最初可能用于画院山水画创作的师承授受。

暨南大学陈志平的《〈墨池编〉的学理分类和古典书学知识谱系的形成》一文，通过对朱长文《墨池编》内容体系及书学思想的剖析，探讨《墨池编》的学理分类及对后世书学谱系形成的意义。北宋书学理论家朱长文编撰的《墨池编》分类适当、收罗完备，并对宋以前的书学知识谱系进行建构：加强“书学”与“字学”的联系、整理“笔法”类文献、重视书法“人格化”与“文学化”、增加金石法帖的鉴赏与研究，扩充文房器具类文献等。《墨池编》沿袭晋唐以来对“书学”的基本理解，又以“墨池”的大概念扩展和丰富传统“书学”内涵，涵括了与书法有关的行为、观念、理论、实物及周边知识，促进了书学发展，为古典书学知识谱系的生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 明清书画篆刻研究的推进

明清时期的书画、篆刻材料在近年有了新的扩充与开拓，此部分汇报既有从艺术作品本身出发的考察，又有对传统文献的深入挖掘与重新整理；既有对作品形式的分析与研究，又有图像与文献的互证比勘，进一步推动了明清书画与篆刻艺术研究的发展与深入。

南京中医药大学沈歆《莫厘王氏所藏三种〈五同会图〉——从新见上图本说起》一文，通过新见上海图书馆藏《五同会图》，对《莫厘王氏家谱》中著录的三件《五同会图》进行爬梳辨析，并探讨此类肖像画在家谱中的意义。从上图本《五同会图》画面、题跋及著录可知，该卷为王鏊家族原藏本。至晚清时期，吴宽、吴洪原藏本，以及上图本《五同会图》皆入藏王鏊家族。通过莫厘王氏家谱著录与《五同会图》的比勘研究，沈歆指出国博本为《莫厘王氏家谱》著录的《五同会图》之一，上博本为《五同会图》之二，上图本为《五同会图》之三。这一时期的家族收藏先祖遗像，通常用于岁时供奉，而《五同会图》收录的序文、题跋等材料逐渐成为家族文献的重要文本形式，是家谱著录重要的文献来源。

香港中文大学陈冠男的《湘水湘山是我师——王宸与潇湘》一文，从画家王宸的生平及绘画作品入手，讨论王宸对《潇湘图》及潇湘景色的情感，从而窥见其家世与交游际遇对画风的影响，进而思考清中期“正宗画派”的创作模式。王宸被称为“小四王”之一，其绘画一方面承自南宗，常临仿传董源《潇湘图》；另一方面他也推崇北宗，学习马远、夏圭。除临古外，王宸曾任湖南永州太守十年，阅尽潇湘山水，晚年常以《潇湘图》画意绘写当地山水。陈冠男指出，家族传承的临古传统是王宸绘画的基础，但置身其中的潇湘山水也成为他取法的另一渊源。从王宸的画风可知，以“四王”为代表的“正宗画派”在清中期仍有深远影响，而王宸在临古之外所辟的取法路径，可以给清中期“正宗画派”的相关研究带来新启发。

黄山学院周康正的《丛林寺壁画与丁云鹏考释》对位于歙县小溪村的丛林寺水墨观音罗汉壁画的作者进行考定。坊间传说丛林寺壁画为明代休宁画家丁云鹏所绘，周康正从图画中的观音图像、背景处理方式、绘画技法等方面入手，将丛林寺壁画与丁云鹏作品进行比对，并通过文献研究指出，现存丛林寺壁画乃清代同治七年（1868）重修之后的作品，作者应为清代徽州民间画师。壁画以丁云鹏的部分版画观音图为蓝本，绘制了现存的丛林寺水墨观音罗汉图。

浙江大学赵晶的《戴进入京前后史事探微》从传统文献的整理与挖掘出发，对明初著名画家戴进于宣德三年（1428）入京前后的相关史事进行考辨，探讨其入京对于浙派绘画发展的重要意义。赵晶指出，戴进入京有一定的偶然性，这与其在“画神门事件”中遭到浙江按察使林硕的刁难有关，此事发生后戴进受福大监裴可力的推荐入京成为宫廷画家。而戴进入京后在画院地位不高，与其非文人的出身、绘画风格与明宣宗的好尚不符，以及宦官裴可力的失势皆有关系。虽然如此，戴进在京期间得以一窥内府及士大夫收藏，开阔眼界，并与文人群体广泛交游，扩大声望，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了浙派绘画发展，使其成为明代前期占主导地位的绘画流派。

天一阁博物院陈斐蓉《丰坊用印研究》一文，整理分析了丰坊用印的内容、文字来源、钤印规律，以及同文异式印等方面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印章与作品辨伪之间的复杂关系。丰坊用印内容多变，主要为字号、出身、郡望、职官、退隐遁世、修道炼丹等内容，且喜用三代钟鼎铭文及古文奇字入印。其作品中多有较为固定的用印组合，

晚年手卷中常见印章竖向排列。对于不同的场合及受书人，丰氏亦钤盖不同的印章，甚至使用特制印章。除此之外，丰坊作品常见同文异式印，这也为相关作品的辨伪带来一定的困难。陈斐蓉指出，印章的内容与变更、钤印的规律与特点，是作品断代、鉴定真伪的重要依据，而在面对印式“孤例”的作品时，也需谨慎对待。

山东大学陈硕的《论邓石如印谱的编纂与研究》，结合新发现的邓石如《笈游日记》《完白山人印谱》等一手材料，对读传世的邓石如印谱，提出重新评估邓石如篆刻实践与历史地位的必要性及可行性。邓石如传世的印谱及原石数量稀少，具有来源混乱、真伪复杂的特点。而新见《完白山人印谱》作为可靠的邓氏自钤印谱，印作优劣参差、面目复杂，呈现出邓石如早期篆刻形态与交游格局，也说明魏锡曾“印从书出”的言论难以概括邓氏一生的篆刻实践。陈硕指出，《完白山人印谱》中呈现的邓石如尝试性、应酬性或有失水准的作品，不仅无损邓氏的地位，反而使其形象更加丰满、历史脉络更为充实。因而在研究篆刻作品时，要谨慎对待真伪问题，避免以成熟风格的代表作指代所有作品。

五 新材料带动的新方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学科边界的模糊，以往被忽视或秘而不宣的新材料不断涌现，为艺术史研究带来了众多机遇与挑战。本单元的报告以经验分享为主，旨在交流艺术史研究中使用新材料与新方法的经验与教训，并就如何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加以应用展开集中探讨。

金融时报艾俊川在《E考据与艺术史研究举隅》中，分享了自己用E考据解决问题的经验与教训。他以提炼并检索信札中“1864、湘乡、山西、湖北、巡抚”等关键词，判断出“思补过斋主人”为曾国荃别号的实践经历为例，说明E考据使用的重点是在原文献的基础上提取与组合恰当的检索点。基于此法，他得出《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尺牍》第七册方震孺尺牍的受信人为黄宗羲，以及现存上海博物馆藏《祭黄几道文》卷并非王世贞旧藏的结论。同时，艾俊川也谈到其在查找《庞虚斋藏清代名贤手札》中一位名为“秋岩”的上款人时，受中国基本古籍库误导将“櫛”字误读为“儒”的情况，说明E考据检索的结果只能作为线索而非结论，回归原始文献以辨别真伪仍是至关重要的步骤。

《活计档》是“清代内务府造办处承办官中各项活计档册”的总称，近年来其史料价值愈发引起文史研究者的重视。浙江大学张震的《试析活计档在清代宫廷绘画创作与鉴藏研究中的价值》一文，就《活计档》对清代宫廷绘画创作与鉴藏研究的史料价值展开深入阐发。除了提供宫廷绘画创作的具体信息外，《活计档》还包含宫廷画家的籍贯、生平、职级等信息，亦含有宫廷绘画组织设置时间、人员结构、画家待遇、运行规则等内容，为宫廷绘画组织机制的研究提供基本史料。在书画鉴藏方面，《活计档》记录了宫廷绘画作品的来源、时间、地点、装裱等细节，为研究宫廷收藏的绘画题材偏好和品评标准等提供证据。最后，张震通过考证指出，《活计档》所载的悬挂于静怡轩的两幅有替换关系的画作，正是传世的《一是一二图》。

故宫博物院秦明的《以文献为中心：刘九庵书画鉴定方法体系研究的建构》，回顾了古书画鉴定家刘九庵先生的书画鉴定与文献工作，同时介绍了故宫博物院“刘九庵书画鉴定方法体系研究”课题的进展情况与实施路线。刘九庵先生入职故宫博物院后，从被人忽视的书札入手，研究宫廷外的非主流画家以及书画作伪手段，解决了大

批书画鉴定问题。课题组通过复原“1956-1997年《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形成过程流程图”，以及制定“2016-2025年刘九庵书画鉴定方法体系研究路线图”，进一步明确刘九庵“鉴定方法体系”的研究路径。并将同时推进影印、文字、图录等多种出版形式，完善以刘九庵先生论著为中心的出版内容体系。最后，秦明通过撷取刘九庵的相关材料，再现了刘九庵、汪世清二位先生深厚的学术情谊。

中国书法家协会李宁《舶载的范本：明清赴日唐船上的中国印谱》一文，以日本江户时代的长崎中日贸易舶载诸书目为切入点，梳理并考察唐船舶载中国印谱的数量、种类、刊刻时间、舶载时间以及价格等问题。日本的篆刻艺术在江户时代启蒙并迅速发展，这一时代唐船舶载的明清印谱多达55种，刊刻时间多集中于明万历、清康熙及乾隆年间，正是中国篆刻较为活跃的时期，可知江户时代的篆刻主要学习明清时期的印谱。印谱包括了古玺至明清流派印等不同时期的篆刻作品，其中三桥派、娄东派等因群体集印的方式难以系统呈现篆刻风格，而雪渔派、泗水派等因呈现了该派某位印人的篆刻风格，故而易被接受及传播。李宁指出，相较于中国口传心授、稳定传承的篆刻发展，日本篆刻主要通过印谱资料进行学习，因此产生了风格杂糅的篆刻艺术。

本次研讨会围绕纪念汪世清先生以及艺术史文献的相关主题展开，会议在讨论汪先生对于艺术史文献所做贡献的基础上，展现了唐宋元书画史料与图像、明清书画篆刻材料的拓展、徽州地区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既有传统文献的整理与挖掘，又有新材料的支撑与拓展；既有著录与考证的传统方法，又有E考据等新的研究方法；既有从作品本身出发的研究，亦有文献与图像的相互考证。汪世清先生以其言传身教提醒我们，精深的文献功夫和专注的学术精神始终是做好艺术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石，希冀在未来艺术史学者可以将传统文献的深入研究与新方法的运用结合起来，共同推进中国艺术史研究。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艺术史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张 露)